

序 章

战后日本外交史概述

一、战败前日本外交的历史回顾

战后日本外交史，是日本由战败投降走向经济复兴、由冷落于世界外交舞台而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并一展身手的全过程。今日日本是昨日日本的延续，战败前日本外交则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出发点。自 1853 年美国培理舰队闯破幕府锁国之门，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并被美国单独占领，近代日本外交经历了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853—1868 年。该阶段虽然短暂，却独具意义。其一，自我封闭状态被打破，近代外交起步。通过 1854—1855 年幕府先后与美、英、俄、法、荷兰等欧美列强订立“友好条约”，日本被迫开放港口、允许设置外国领事馆并接受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实施 200 余年的锁国政策破产，无可奈何地登上近代国际外交舞台；通过 1858 年与上述欧美五国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和 1866 年订立“改税协定”，日本只得承认自由贸易原则，开国通商，被强行纳入以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国际公法体制，彻底告

别了闭锁、停滞的锁国时代，走向开放，涌现出川路圣謨、堀田正睦等首批外交官。其二，外交问题激化国内矛盾，加速幕府的灭亡。由自身落伍导致的软弱，初登世界外交舞台的日本被迫采取屈辱外交的低姿态，在欧美列强炮舰政策的威压下，承认列强享有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殖民权益。日本民族因此而沦为被压迫民族，面临半殖民地化乃至殖民地化的严重危机。民族矛盾加剧着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抗争。开国后，以农民暴动频发为先导，中下级武士发动尊王攘夷运动和武力倒幕运动，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并东征江户，幕府统治被推翻。其三，国际法观念深入人心，“海外雄飞论”抬头，维新先驱者开始了近代对外方针的构思。开国后，列强挥舞炮舰兵威和万国公法两条大棒，在日本推行强权外交，这就迫使日本人在研制炮船的同时也设法弄清万国公法为何物。1864年汉译《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出现识者竟读此书的盛况，在许多藩的改革中，以遵循《万国公法》为新政宗旨或处理纠纷的法律准绳，以至志士仁人发出刀剑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慨叹。

《万国公法》打开日本人的国际视野，“海外雄飞论”应运而生。1855年吉田松阴力倡此论，并勾勒出近代日本的对外方针是“严守条约以羁縻俄美两国，乘机垦虾夷（即今北海道——引者注）收琉球、取朝鲜、据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①，从而提出“大陆政策”和南进方针的雏形构想。

第二阶段：1868—1895年，确立与国内维新改革相适应的对外方针，迈出追求大国目标的步伐。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在政府宣布的第一份文件《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强调自1853年以来，日本“遭蒙未曾有之国难”；宣告废除幕府，“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号召公武众庶：“各自勉励，一扫历来

^①《吉田松阴致久坂玄瑞书信》，《大日本思想全集》第1卷，吉田书店1932年版，第113—114页。

骄情之陋习 以尽忠报国之诚意。努力奉公为要!^①由此可见 自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当政者就把摆脱“国难”与“挽回国威”,视为维新变革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将内政、外交规定为推行新政的两翼。一个月后,维新政府采取了首次外交行动,通告各国驻日公使政权已由幕府将军之手转归天皇朝廷,并要求修改幕府与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4月6日一天之内,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维新纲领《五条誓文》和对外总方针《宣扬国威宸翰》,提出“与万国对峙”“宣布国威于四方”即成为世界强国的总目标。为此,对内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即采用西方议会制度,建立以天皇为最高元首的举国一致体制;对外强调“求知识于世界”,“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②面向世界,开放进取,破除锁国攘夷等陋习,加入以“天地之公道”即以《万国公法》为通则的国际社会。在“誓文”与“宸翰”中,内政外交方针相互支撑,浑然一体,其核心无非是安内竟外。竟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亚洲邻国与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针是“脱亚入欧”,基本策略则是倚强凌弱、远交近攻,即加紧对朝鲜、中国等亚洲邻国的侵略,挤进欧美列强的大国行列。

上述方针策略决定了明治前期日本外交的基本走向。一方面,对欧美列强推行妥协、退让、追随的软弱外交;另一方面,对中国、朝鲜则实行挑衅、施压乃至侵略的强硬外交。这种两副面孔外交的实例不胜枚举。1871—1873年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12国,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而首遭美国拒绝后,使节团放弃改约,转而考察欧美文物制度,并决心仿效普鲁士,以武力扩张来创建日本帝国。1871年与中国谈判缔结《日清修好条规》时,起初欲将不

《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维新史料编辑会:《维新史》第5卷,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390—391页。

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继而声明无意同中国建立攻守同盟，最后为了取得与清帝国对等的“上国”地位，设下谋取朝鲜的伏笔，这样才并无诚意地订立“条规”。时隔不久，1874年即兵犯台湾，又狐假虎威，联合英国向清廷施压，勒索白银50万两，给中日关系笼罩上浓厚的阴影。再如1875年由外务卿寺岛宗则提议于1878年正式开始的东京不平等条约修改谈判中，寺岛、井上馨、大隈重信、青木周藏、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等外相，在长达16年的马拉松式交涉中，面对态度蛮横的欧美谈判代表，一再忍让，抗争无力，甚至主动提出任用外国法官、司法欧美化等损伤主权的条件，取悦欧美诸国，以求谈判有所进展。政府在收回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方面的软弱立场，以及鹿鸣馆洋式舞会的频繁举行，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1892年主张先着手解决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并竭力迎合英国对抗俄国在远东扩张的方针，遂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提高部分税率。在采取对欧美列强委曲求全政策的同时，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频频升级。1875年制造“云扬”号挑衅事件，次年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取得领事裁判权及免税权，又以承认朝鲜为“独立国”的名义，切断朝鲜同清廷的宗属关系，加紧对朝渗透。1884年策动亲日派夺权的甲申政变受挫后，开始大规模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1890年确定“大陆政策”，1894年付诸行动，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次年战胜并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甲午一役，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打开其独霸朝鲜的通道，日本从中国劫获相当三年岁入的巨额战争赔款及台湾、澎湖列岛，使中国益加贫弱，东亚的国际格局剧变。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日本转变为压迫民族，上升为地区性大国乃至远东一霸，“脱亚入欧”方针初步实现。

第三阶段：1895—1918年，日本加入欧美列强间的争霸角逐行列，转变为帝国主义世界大国。甲午战争后，日俄围绕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势力范围的矛盾日趋激化。为报俄国联合

德国、法国而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的还辽之仇，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卧薪尝胆，加紧备战。1902年与英国缔结第一次《日英同盟协约》，完成对俄作战的外交准备。1904年2月挑起日俄战争，1905年5月俄国战败，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夺得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获取对朝鲜的完全支配权，并从俄国手中割取旅大地区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间铁路及其沿线所附属的一切权利。以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的外交相当活跃，1905、1911年与英国先后缔结第二、第三次《日英同盟协约》，1905、1908年与美国订立《桂塔夫脱备忘录》、《高平·鲁特协定》，1907、1910、1912年与俄国三订《日俄协约》等固守日英同盟的基本外交阵地，纵横捭阖于大国之间，与列强分别就分割在朝鲜、菲律宾、中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的利益线和势力范围，达成公开的或秘密的协定、条约，巩固日本殖民扩张的阵脚，并伺机于1910年吞并朝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日本政府视为天赐良机。日本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更大范围内与美英等国展开新一轮的争夺。1915年日本公然提出独霸中国的“对华21条要求”，急欲把中国变为第二个朝鲜。日本的举动招致美国的不满，1917年双方达成《石井·蓝辛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对华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则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背着中国，侵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1918年在帝国主义强国操纵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取代德国，攫取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同时，又以五大战胜国之一的身份，与美英法意四国对等地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宰割弱小国家的大国俱乐部即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还充当了国际联盟的发起国。至此，日本完全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海外雄飞”、“脱亚入欧”等梦寐以求的大国目标，日本驻欧美国家的使节也由公使升格为大使。

第四阶段：1918—1930年，日本与美英两国争夺远东、亚太地区霸权的角逐日益表面化，由于在投资、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尚

须仰仗美英等国，日本在争夺中暂居下风，推行同美英协调与对华加紧侵略准备相并行的外交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投机性的“大战景气”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而消失，海外市场占有率减缩、生产规模骤降、东京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经济陷入不景气的低谷。工农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朝鲜和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浪潮接连涌起，干涉苏俄革命的西伯利亚出兵劳民伤财，一无所获。种种不利因素削弱了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立场。1921年日本与美英法签订调整太平洋地区利益冲突的《四国条约》，同意在该约生效的同时《日英同盟协约》即告废止，从而丧失对外扩张的外交依托。

1922年屈从美国的压力，订立限制建造主力舰吨位的《五国海军协定》 签署《九国条约》 宣布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又与中国订立《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从山东撤军，放弃“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要求，独霸中国的图谋严重受挫。1924年政党内阁成立后，愈加秉承三井、三菱等老财阀避免与美英对抗的旨意，全面推行对美英等国的协调外交。1930年与美英两国订立《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同意美英各拥有主力舰 15艘、日本拥有 9艘，辅助舰总吨位日本为美国的 70%等。在军备竞赛中，一边对美英做出让步，一边加速军队的现代化。

与竭力避免与美英正面对抗的协调外交成鲜明对比，日本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强硬方针。1927年 6月召开军政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通过干涉中国内政并以肢解东北、内蒙地区为主要目标的《对华政策纲领》。1927年至 1928年三次出兵山东，制造致使中国军队死伤数千人的济南事件和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又将关东军司令部北迁至沈阳，意欲挑起新的事端。这一期间，与“东方会议”有干系的《田中奏折》被曝光。尽管其真伪有待证实，但“奏折”提出的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兵进南洋诸国的侵略步骤，在四年之后被日本政府逐

一付诸行动，外交完全被纳入战争轨道。

第五阶段：1931—1945年，战时外交时期。14年间，日本的战争机器如同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38—1939年先后在张鼓峰、诺门坎与苏军冲突，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南侵东南亚诸国，战争逐步升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致发展到国力难以支撑、当局无法驾驭的地步，自招败亡。14年战争期间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是——

（一）外交基本方针由明治时代以来的“脱亚入欧”，转向排挤美英、独霸亚洲。美英两国曾经是近代日本长期仿效、追随的对象与谋求国家利益的外交依托，亲美英派在财界、政界、海军界大有人在。但内因以陆军为核心的军部法西斯日益猖獗，外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危及美英在华利益，美英对日政策转趋强硬，日本对美英的外交方针急转直下。1936年广田内阁将“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及“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等两项方针规定为“根本国策”，把“防备美英”、“排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密切合作”作为“大陆政策的基调”，^①初步确立了对抗美英、独霸亚洲的基本方向。为此所采取的重大行动是：当年远交德意法西斯，订立协定；次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果。1938—1939年对苏武力冒险受挫后，频繁更换内阁，排斥力主对美英协调的势力，设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加紧对华战争，建立“东亚新秩序”。1940年9月，乘德军横扫西欧之机，兵进法属印支北部，订立《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相互承认在欧亚大陆建立“新秩序”的指导地位，亚洲俨然成为日本的禁脔。1941年4月，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解除北顾之忧。9月，针对日军进占法属印支南部后美英采

林茂：《太平洋战争》（《日本历史》第25卷），中央公论社1967年版，第22—23页。

取冻结日本资产、石油禁运等制裁措施，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纲》，限期完成对美英等国的战争准备。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席卷东南亚，用刺刀建立起包括中国半壁河山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挫美折英、独霸亚洲，凶焰万丈。

（二）外交决策权逐渐被法西斯军部支配，外交活动从属侵略战争的需要。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订立后，军部和民间法西斯势力指责内阁缔约侵犯了天皇统帅权，掀起攻击“软弱外交”的沙文主义狂热。1931年刺杀首相滨口雄幸，1932年法西斯军人发动兵变，推翻政党内阁，迫使前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主张对美英协调外交的人士退出政界。在军部压力下，斋藤内阁建立首、藏、陆、海、外五相会议制度，扩大军部的发言权，并于1933年退出国联，继后的冈田内阁则于1936年退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二·二六兵变后，军部对组阁横加干涉，广田屈服，拒绝吉田茂等亲美英派入阁，又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直接对外交指手画脚。此后，在近卫、平沼、阿部、米内等历届内阁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增强，把持内政与外交。至1941年10月陆相东条英机组阁时，索性一度兼任外相，外务省成了军人的天下，外交堕落为军事侵略的奴仆。同年11月来栖三郎等外交特使在华盛顿的谈判，竟成为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掩护行动，就是典型一例。

（三）外交谋略缺乏长远考虑，目光短浅，冒险、投机色彩强烈。相对而言，明治时期日本外交谋略比较谨慎，有些眼光；伊藤博文、小村寿太郎、林董等外交家善为本国利益策划，进退有度，可谓老谋深算。如日俄战争前后，先是卧薪尝胆10年之久，其间利用英俄矛盾，开展有效的外交活动，争取到有利的国际支持；后来则抓住俄军新败、国内动荡之机，与俄国停战缔约，未被对俄强硬的主战论者搅乱方寸。进入昭和初期的三四十年代，国际格局变动剧烈，矛盾冲突四起，形成对日本外交能力和谋略的有力挑战。判断一着失误，则带来满盘皆输的严重后果。恰在此

时，法西斯化的狂潮席卷列岛，民族优越、日本至上、无与伦比的沙文主义情绪日益狂热化，短视的、投机冒险的心理支配了外交谋划，全局性的判断错误接连发生，且互为因果、一误再误，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局面。在伊藤、小村们可能避免的失误，到了松冈洋右、东条英机等法西斯狂人手中，却视而不见，有进无退，失去控制。如 1933 年为赖在中国东北不走，竟退出国联而自绝于国际社会；1937 年以“三月内灭亡中国”的一厢情愿为基础，悍然全面侵华；1940 年因纳粹德国的一时得势而丧失理智的判断，联合德意，加紧侵华，对抗美英；1941 年低估了美国参战的决心和实力，挑起太平洋战争，等等。从侵华战争开始的大规模军事冒险，使日本军国主义迅速陷入中国全民抵抗的泥沼中而无力自拔；为打破侵华战争僵局、掠夺东南亚资源的新一轮铤而走险，则使日本痛遭反法西斯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被迫在 1945 年无条件投降。至此，独霸亚洲的帝国梦连同战时短视、投机冒险的外交路线彻底破产。

回顾战前日本外交历程，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历史启迪。第一，外交为日本国脉所系，外交路线方针的得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的兴衰。明治初期，当日本尚处于屈辱的被压迫地位时，“海外雄飞”“与万国对峙”方针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达了日本民族摆脱落后、赶超欧美以成为世界强国的正当愿望；另一方面也包藏着统治阶级对外扩张、建立大帝国的意图。随着日本挣脱民族压迫而崛起，后者占据对外方针的主导地位，在其引导下，通过无休止的扩张，一度圆了帝国梦，但多行不义却导致最终败亡。第二，面向世界的对外方针，使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率先仿效欧美，曲折地踏上资本主义道路。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日本采取“脱亚入欧”或排除美英、自封盟主并独霸亚洲的对外方针，以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强化统制体制，解决市场、原料问题，榨取海外廉价劳动力。上述方针虽然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却犯了以邻为壑、四处树敌等外交大忌，沦

为国际孤儿。第三，在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如何处理日中关系是关键所在。与近代日本朝野的中国观的变迁——即由亲近、尊重到冷漠、蔑视的转变过程相同步，近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也经历了从友好到竞争、由对抗到兵戎相见的转化过程。其具体策略无非是从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起步，继而霸占朝鲜并以此为跳板，谋取中国东北，随即用兵关内广大地区。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升级，势必与美英等国交恶，引发太平洋战争。这样，战败投降自然成为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和则两利，战则俱伤，这就是从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可以得出的血的教训。

二、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确立及其演变

战败投降、帝国崩溃、经济凋敝和衣食匮乏等冷酷的现实，迫使日本朝野反省战败前所发生的一切。1945—1952年美国占领期间，在全面实施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清算大日本帝国的同时，改弦更张、重新制定战后外交路线的工作提上日程。虽然战后初期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多次造成政府危机，但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通过日本政府实现间接统治，所以，确立战后外交路线的主导权便落入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之手。美国为了削弱、制服日本，并把这个昔日亚太地区霸权的争夺者改造为尊重和支持美国目标的追随者，选择、扶植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亲美派执掌政权。而被迫就范、身处逆境的日本统治阶级，虽如俎上之鲤，听任宰割，却从未放弃再现帝国“荣光”的企盼，等待着重跃龙门的那一天。为此，日本政府继续沿用依托其他大国的庇护、伺机发展自己的故伎，又秉承财界要求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旨意，迅速确立了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即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对美实行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或维护日美特殊关系为总方针，求得国家的安全、复兴和发展。1947

年6月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认为：战后世界出现“美英势力圈”和“苏联势力圈”，美国占据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导地位，日本属于“美英势力圈”之内，但又地处“苏联圈”附近，地位微妙。1947年6月，战后日本外交路线奠基人吉田茂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要高举反共民主的大旗，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它们的援助下，实现日本的复兴。”^① 占领时期的具体外交目标，则是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恢复国家主权地位，重返国际社会。为实现上述目标，吉田政府利用1947年美苏冷战对峙开始、1948年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等世界与东亚地区国际形势剧变，美国决心把日本变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和东西方对抗前沿阵地之机，迎合美国的战略意图，不顾国内外的抗议与谴责，1951年订立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以及损伤日本国家主权的《日美安全条约》，从而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肯定了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方针。随后，按照吉田“订立媾和条约，日本独立；这一独立需要安全条约保护”，作为“安全条约的细目，由日美两国政府之间订立的行政协定规定”的思路，^② 1952年签订《日美行政协定》，同年又遵奉美国的授意，与蒋帮订立“日华和平条约”，设置了阻滞中日邦交正常化达20年之久的巨大障碍。

1952—1960年，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其外交路线随之出现对追随外交的局部微调。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受到朝鲜战争“特需”景气的刺激，进入全面复兴、起飞和高速发展的轨道。经济状况的好转，使保守党渡过战后初期的政治危机，特别是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之后，形成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以及自民党在朝、社会党等在野，执政党与在野党力量对比定局的“五五年体制”。另外，随着《旧金山对日和约》

^① 小岛正固、竹内雄：《吉田内阁》，佐藤印刷所1954年版，第9页。

^② 同 第43页。

生效，占领时期结束，日本恢复主权地位，与大多数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亚洲，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1954年印支恢复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实现法越停战的《最后宣言》的发表，使东西方对峙的势头有所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吉田亦步亦趋追随美国、顽固坚持反华反共立场的外交方针，已不合时宜并在国内引起日益强烈的不满。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组阁，在不触犯日美特殊关系的范围内，对外交总方针加以局部调整，重点改善日苏关系，以便为日本加入联合国打开通路。几经艰苦的反复谈判，至1956年10月，鸠山以日苏复交实现后即退出政界为条件，说服党内反对派，并率团访苏，两国发表邦交正常化的《日苏共同宣言》，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继任的自民党总裁石桥湛山组阁，宣布要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有所作为。此举不啻是对吉田追随外交路线的又一次调整。遗憾的是，由于石桥健康不佳，其内阁仅存在两个来月即宣布总辞职，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因而拖后了若干年。

1957年2月，岸信介组阁执政，外交路线重新向吉田对华方针大幅度靠拢。1957年岸两次出访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等15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行经济外交的同时，进行敌视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两国关系再趋紧张。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是岸内阁反共反华方针必然造成的恶果，中日关系骤然降至零点。岸出访东南亚诸国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等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推行“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的南进论”，搞日本再做亚洲“盟主”的“中型帝国主义”。因此，在公开场合，岸以“先进国家”的首相自居，侈谈亚洲国家“如果没有先进国家的协助，技术和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自立”，强调“日本是亚洲的日本”让日本作为亚洲的“代表去和美国握手就会给日本增添光彩，

也会给整个亚洲增添光彩”。^① 联系岸提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外交三原则”，表明恢复了自信心的日本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急欲充当亚洲主导力量的愿望。实现这一愿望的必要前提，是进一步巩固、调整日美关系。通过岸内阁与美国政府修订旧《日美安全条约》，并由日本国会于1960年强行批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简称新《日美安全条约》）。删除旧条约中关于美军有权镇压日本内乱等与独立国不相称的条款，强调两国对等合作，竭力洗刷美国附庸色彩，进而要求建立日美对等伙伴关系，开创“日美关系的新时代”。

1960—1972年，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先后组阁。这一期间，日本自主外交的步伐逐渐加快。自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来，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的驱动下，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走向自主外交的物质基础。随之而产生的下列因素，即经济大国日本要为自己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确立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以及日美“纤维大战”加剧、贸易摩擦持久化，美国日益陷入侵越战争泥沼和 大国争霸怪圈而无力自拔、国力衰落等，促使日本外交逐渐脱离 对美追随的一边倒旧日，加快转向自主化。在池田内阁执政时期，实行自主外交的必要性成为外务省经常谈论的话题；1964年池田访美，宣布日美已形成“平等伙伴关系”；日本与西欧的关系进入活跃时期，日趋密切化；池田内阁的对华方针也由岸内阁的消极转为积极，两国间的人员交流频繁起来，1962年达成《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T·L协定）和互换常驻记者协议等，展现出自主外交的新姿态。

1964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其外交政策以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和解决冲绳回归问题展开。1965年订立《日韩关系基

^① 田尻育三：《岸信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148、150—151页。

本条约》，介入朝鲜半岛事务。1964年出访东南亚地区，扩大日本的影响。以“完成亚洲安全任务的主角”自居，并以分担美国在亚洲的防务为交换条件，1972年与美国缔结《归还冲绳协定》，宣布日本“朝着太平洋时代前进的时刻已经到来”，^①从亚洲大国向亚太大国跃动的新目标，已呼之欲出。然而，佐藤内阁的外交新进展是以呆板、死硬地追随美国反华政策、妨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基础的。一俟美国对华方针发生变化，佐藤外交立即陷入狼狽处境，成为国际外交的笑柄。显而易见，日本政府对华方针如何，已成为外交自主性强弱的衡量尺度。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格局骤变，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适应上述变化，同年7月组阁的田中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最大使命，9月访华，又抢在美国之前，一举恢复中日邦交。田中访华不仅解决了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悬案，中日关系从此进入历史新阶段，而且表明日本外交的新方针，即维系日美特殊同盟关系，加重自主外交的分量，构筑远东地区日、美、中等边战略三角关系，使日本游刃其间，取得战略主动并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1972—1978年田中、三木武夫、福田赳夫等三届内阁进一步调整外交路线，先后提出“多极自主平衡”、“等距离”、“全方位”外交方针，以应付多变的世界。田中访华后，再次访美，又马不停蹄地走访西欧、苏联和东南亚、大洋洲、拉丁美洲诸国，足迹几遍全球。其间，还先后邀请意大利、澳大利亚的总理，毛里求斯议长、比利时国王、美国总统来日访问。外务省送来迎往，十分繁忙。三木执政时期，外交更加活跃。政府首脑访苏、访美，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来往穿梭于大国之间；作为国家和国民统一的象征的天皇也步出国门，首次访问美国；一时间，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总统，英国女王，摩洛哥首相，约旦国王，新西兰、澳

^① 冈本文夫：《佐藤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330页。

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巴西、斯里兰卡总理等来自五大洲的贵宾纷至东瀛，华盖云集，前呼后拥。福田执政期间，首相除按惯例出访美国、东南亚、西欧外，还特别前往中东国家访问，把 1973 年以来的“石油外交”推向新高潮。福田还作出决断，缔结包括反霸权条款在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解决了田中访华后遗留下来的重大外交问题，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日本外交进入繁忙期，是田中“多极自主平衡”、三木“等距离”、福田“全方位”等外交方针导向的结果。进一步说，上述方针的出台又并非偶然，是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苏争霸加剧并波及日本、中美接近、中苏对峙、西欧崛起、阿拉伯世界拿起石油武器等多极并存的国际形势所采取的对应之策。“多极自主平衡”、“等距离”、“全方位”方针并未脱离日美同盟关系的基本点，其核心仍旧是谋求日本国家目标和最大的经济利益。左右逢源、八面来风的外交行动增加了日本的发言分量，也为下一阶段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拓宽了活动场所。

1978年以来，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祐、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自民党总裁先后组阁。1993年8月，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内阁成立，结束了自民党垄断政权达38年之久的历史。至此，“五五年体制”崩溃，日本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代。但细川内阁的外交方针至今尚未突破大平内阁以来的基本框架，换言之，非自民党内阁仍执行着自民党内阁的外交路线。因此，不妨以大平至宫泽的外交方针为分析对象，侧重探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外交路线的新变化。

在上述八任首相中，对该时期日本外交决策影响最大者，首推大平。以经济、金融、科技实力的迅速增长为后盾，1978—1979年，大平内阁提出80年代的国家发展战略，即构筑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相呼应的总战略，迈出追求大国地位的新步伐。作为与之相配合的外交方针，则亮明“西方一员”、“亚洲一员”、“联合国一员”的旗号，取代“全方位”外交方针，在

国际社会抵制或制裁苏联、越南的联合行动中，日本旗帜鲜明地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联合中国，对抗苏联。此外，大平内阁还提出“承担全球责任”、“经济国际化”等对外方针，其影响至今犹在。

继大平之后，中曾根在推行“积极自主外交”的过程中更加起劲地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1983年7月，中曾根宣布：“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还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①一语惊人地表明日本争当“政治大国”、彻底调整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失衡结构的决心。为此，中曾根在五年执政期间，先后采取包括清除战败国意识在内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积极介入国际热点问题、突出日美欧三极中日本的地位、加快国际化步伐并建立“国际国家”等步骤，开展反映日本意识与主体性的外交。在这一过程中，1985年开始的“日元增值”景气和次年自民党竞选的大胜，是驱动中曾根外交全面展开的强大动力。

1989年，东欧形势骤变，1991年，苏联解体。战后以来以美苏对峙为基轴的两极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多极化并重建国际新秩序的新时代。1990年3月，海部俊树强调运用日本的经济、技术力量，积极参与建立“新秩序”。为此，日本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对欧洲国家推行经济、政治并行的新欧洲政策，全面介入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强调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协调合作，密切日本与“四小龙”、东盟的关系，改善中日关系，力求建立新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体系。1991年以来，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漏洞百出，市场萧条、消费停滞，资产价格急剧下跌，银行贷款能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外交大国”目标的落实。尽管如此，1993年1月，宫泽喜一在第126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仍坚持“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概念”，认为日本“举止

^① 吴学文主编：《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已经可以左右国际社会的动向”，应对建立新秩序“作出与国力增长相应的责任和作用”；强调日美能否“联合起来发挥领导作用将极大地左右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前景”；强调“要与欧洲共同体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加深对话和政策上的协调”，^①俨然以与美国、西欧鼎足而立的“外交大国”自诩了。同年 3 月，在外务省经济局总务参事官美根庆树主持下，东京银行会长行天丰雄、经团联常务理事糠泽和夫、外务审议官松浦晃一郎等，就“日本作为亚洲太平洋的代表所应采取的行动”问题，举行讨论，认为必须思考“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如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问题，强调日本不仅能作为“亚洲的代表”，而且能代表“亚洲、太平洋”出席在东京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②愈加公开地表明大国意识，并以亚太地区的领导国家自居。这一期间，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应活动也在加紧进行。

1993 年 8 月日本政坛风云突变，一党单独执政 38 年的自民党下野。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先后出任多党联合内阁的首相，日本进入多党联合执政、各党派加快分化组合并向两大保守政党轮流坐庄发展的新时代。虽然在反省侵略、强调亚洲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联合政党内阁比纯自民党内阁态度明朗，但由于外交有别于国内政治，自民党的外交方针促成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并进而走向政治大国，形成战后日本外交总的走势，因此，自民党的外交方针不因该党的下野或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而被抛弃，仍旧主宰着今后的日本外交。随着日本政界自民党化趋势的增长，上述主宰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回顾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演变，并与战败前日本外交的轨迹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大国地位的不懈追

^① 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编：《日本简讯》，第 84 期（1993 年 2 月）第 1、2 4、6 页。

^② 《外交论坛》，1993 年 5 月号，第 29、39 页